

中国内地
和香港地区
老年人生活状况
和生活质量研究

齐 铤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初级中学音乐第五册

教师用书

(简 谱)

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教育编辑室主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初级中学音乐第五册

教师用书

(简谱)

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教育编辑室主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庆延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64圆乐谱文字 4印张

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4,775册

ISBN 7-103-00540-0/J·541(课) 定价：1.20元

目

录

第一单元..... (1)

欣 赏

梁山伯与祝英台 (小提琴协奏曲)

长城随想曲 (二胡协奏曲)

音乐知识

协奏曲

奏鸣曲式

思考与练习

第二单元..... (12)

歌 曲

我和我的祖国

长江之歌

音乐知识

和弦 三和弦 大三和弦 小三和弦

思考与练习

第三单元..... (18)

欣 赏

伏尔塔瓦河

前 言

世界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中国老人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个重要地区。中国老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不仅是中国的成功，也是对世界老龄事业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有系统科学性的老龄事业是由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创建的，这是由于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比较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在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老龄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但许多研究成果和理论仍有局限性，在套用于中国老龄问题研究时更应仔细鉴别，注意哪些是不完全适用的。只有深入了解中国老人的情况，才能正确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法。

中国地广人多，老人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可能相同，面对老龄化如何适应，产生怎样的问题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国老龄化问题上，不可能从一个笼统的角度去寻求答案。比如说老人在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截然不同是众所周知的，北方老人与南方老人的生活状况也肯定有差异。处理中国老龄化问题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取个案形式深入广泛地研究，从每一种类型的社区抽样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作科学性的个案研究。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必须对所选区域有深入认识，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发展角度去解释老龄化问题和解决方法，才具实际意义。

这次调查的中国内地和香港新城区老年人生活状况固然不同，基于两地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的居民，98%以上是中国人血统，主要是广东籍，不过经过长达150年的分割，香港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社会以

市场经济为主导,老人社会福利虽不完全采用西方的模式,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经验积累。中国内地对老人退休福利有一套处理的办法,虽然近年改革开放,这些政策也相应改变,但城市老人的退休福利问题仍广受重视,加上中国传统家庭照顾老人的观念和社区互助的精神,使香港与内地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本研究项目由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齐铤博士主持,于1993年开始向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基金申请经费支持,进行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对比研究。内地新城区的样本地区原仅包括三个:北京、上海和广州。1994年末,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老龄研究中心主任 Neana Chappell 博士对此研究甚感兴趣,另外申请一笔经费加上苏州新城区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地区的选区因素主要基于齐铤博士在1991年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进行的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三地华裔老人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该研究以城市老人为主,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洛杉矶和香港。通过该项研究与国内研究老龄问题的专家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苏州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的姐妹城市,加拿大的卑斯省近年来有大批华人移居,其中老人为家庭团聚而移居加拿大的人数日渐增加,使当地的老人研究学者对华裔老人的生活情况甚为关注。他们除了希望了解老人移居后的生活外,也发现必须了解老人移居前的情况,才能维持并提高老人在加拿大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是一项多学科合作的研究工作,于1994年正式开展,参加工作的研究单位较多,讨论研究的过程也比较长,大家都尽力完成此项工作。除了香港大学的齐博士统筹整个研究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桂世勋教授主持中国内地的联系和指导工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方教授是本研究的顾问指导,除了提供宝贵意见外,也多方面支持此项合作。北京地区的调查负责人是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和鄢盛明讲师,上海地区的调查负责

人是上海大学文学院老年社会研究所的张钟汝副教授,苏州地区的调查由桂教授带领研究生与苏州统计局的人员一同负责完成,广州地区的调查由中山医科大学卫生学院陈成章教授负责。加拿大方面参加的学者主要有维多利亚大学的 Chappell 博士和黎全恩博士以及 Simon Fraser 大学的 Ellen Gee 博士。除了以上各人的通力合作外,也依靠研究助理香港大学博士生宋新明先生的协助,才得以顺利完成。此外,本书的印刷和与出版社的接洽工作由北大鄢老师负责。除了印刷此书之外,本研究的参与者也在各地区发表了一些论文,同时在 1997 年 3 月份于加拿大卑斯省 Richmond 市举行了一次泛太平洋华裔老人研究工作的国际学术会议,本研究的主要参与者都在会上作了讲演。

本书共分四篇。第一篇包括三章,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理论框架和方法,由齐铤博士撰写。第二篇阐述中国内地新城区老年人各方面的生活状况,共分五章,由桂教授撰写个人基本情况,生活与居住状况两章;第三章是有关家庭与社会支持方面的论述,由袁方教授和鄢盛明讲师撰写;第四章是躯体、精神健康和日常生活功能的论述,由宋新明先生和齐铤博士合写。第五章是生活满意度及需求的论述,由张钟汝副教授和齐铤博士撰写。第三篇阐述香港地区老年人各方面的生活状况,基本上也按第二篇内五章体例进行论述,连同第四篇总结和建议,均由齐铤博士负责撰写。本书另外收入了香港地区的调查问卷作为附录(内地所用的问卷与此基本相同,为节省篇幅,未予收入)。

希望此书能使本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报告和发表成果的媒体,引起更多对中国老龄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兴趣。同时本书仓促交稿,不足之处仍请各位读者见谅。

第一篇

研究背景、理论框架和方法

第一章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对全世界的一个新挑战。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大会以及其通过的联合行动计划,标志着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老龄化问题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老年问题研究结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四国研究、西太平洋老龄化研究(Andrews, 1986),已经证明这些国家伴随人口老龄化过程出现的躯体、精神和社会变化,与欧洲国家的研究结果非常相似。

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是广泛的。如果不尽早系统地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那么,21世纪将会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可喜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引起了两地社会学、人口学、老年学、老年医学、流行病学等学科研究者以及有关政策制定者的不同程度的关注,并开展了为数不少的研究,两地老龄化问题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项目也不断增加(Kitano, et al., 1994)。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内地和香港地

区老年人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信息。但其研究人群多来自于城市的老城区和较为典型的农村地区,而对处于两者之间的新城区老年人群的研究则相对少见。

众所周知,中国内地正经历着自 70 年代末开始的举世瞩目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其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在城市周边新城区的迅猛发展,而且这种态势有增无减。从这些新城区形成的原因来看,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在经济特区建设中形成的新城区。1980 年 8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海内外宣布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对引进外资实行优惠政策,由中央政府赋予特区以一定自由权,包括审批一定限额的引进项目的权限,对在特区投资设厂的外商减免税费等。1987 年与 1990 年,中国政府又先后批准了两个经济特区:海南省与上海浦东新区。这些经济特区建设之初,有相当部分是农村地区,以后通过经济特区政府或管理委员会的有计划开发,引进了许多外资项目和中国内地其他地区的项目,不少农村地区演变成了新城区。本研究项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样本,就取自于浦东新区中的新城区。

第二类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工业园区建设中形成的新城区。1984 年 9 月,中国政府在总结第一批经济特区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开发 14 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并批准创办中国内地第一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开发区,同意可以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到本研究项目开始时的 1994 年初,中国内地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 30 个,当时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正在启动。这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工业园区,面积大小不等,但一般都比经济特区的规模要小得多。它们大多位于老市区的边缘,在未开发时属农村地区,以后经过成片开发形成新城区。本研究项目在苏州地区的调查样本,就取自于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

第三类是在城市改造和发展中形成的新城区。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内地的许多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加快了改造和发展的进

程,原在市区的一些党政机关、高等院校、事业单位逐步向市郊结合部的农村地区扩展延伸,在那里征地盖房,形成新城区。同时,不少大城市还把市中心相当一部分旧式住房(包括棚屋、危险房屋)及工厂企业搬迁到城市近郊的农村地区,在市中心置换出来的土地上采取有偿使用(即“批租”)的办法,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建造宾馆、写字楼等现代化建筑物。市、区政府再将市中心土地有偿使用得来的资金用于近郊农村地区的征地、建房、安置原来在市中心居住的市民及工厂企业,以及当地被征土地的农民。

第四类是在城市周边农村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形成的新城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内地广大农村开展了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吸引大批从种植业解脱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务工经商的农民收入,政府采取鼓励乡镇企业(包括村办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使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同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沿海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又凭藉地租比市中心便宜、交通比中西部地区农村方便、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比中西部地区农村高等有利条件,吸引海内外投资者以独资或合资形式开办各类加工企业,吸引众多房地产商建造公寓、别墅等商品房,吸引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投资开店、办厂、建房。在这些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商品房聚集和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便形成了新城区。本研究项目在北京地区所选的海淀区和广州市沙河区的调查样本,就是兼有上述第三类和第四类特征的混合型新城区。

同样,作为亚洲的一个重要经济和金融中心,香港是一个动态、不断变化的城市。自1973年开始,香港进入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占地由70%发展到目前的95%。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是在新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城区(在香港称之为新市镇, New Town)。香港新市镇首先在九龙与新界交界地带如荃湾、观塘等地区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居住和活动面积的需求增加,新市镇的

扩展一直没有停顿,后期主要的新市镇有沙田、屯门、大埔和天水围等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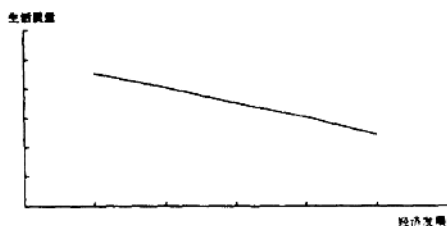
新城区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如城市化带来生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在香港的新市镇还是内地的新城区,老年人将面临对这种变化的适应问题。在发展新城区的同时如何同步发展老年社区服务,满足老年人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医疗保健等诸多方面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般早期的新城区的发展都是多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地理环境等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阻挡不了的趋势,因而也往往顺其自然,甚少有计划地发展,尤其在香港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更加明显。以香港为例,早期新市镇的建设缺乏计划,社区、就业、交通等配套设施都不齐全,如70年代屯门新市镇的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目前屯门已超过50万的居民,社区设施不够、交通不方便和该区就业不足的情况,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典型的例子是80年代沙田新市镇的发展,虽然在社区设施和交通配合的计划性方面有明显改善进步,但为了提供就业,在该区内同时提供工业和住宅用地却带来不少环境污染和卫生问题。总而言之,新市镇或新城区的有计划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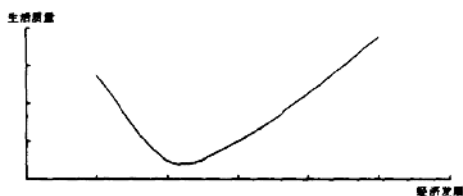
关于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转变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目前学术界仍未有定论,Hugo(1991)认为有三种主流学说。

第一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下降(图1-2-1,A)。伴随着家庭在结构和功能方面趋向于核心化,家庭不再是生产的基本单位,老年人支配家庭成员收入的能力降低。Cowgill(1974)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保健技术和大众传播引入的进程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将下降。其原因是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仅能从事一些传统的低收入工作,与家庭相分离,失去了传统上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地位普遍下降(Hermalin, 1995)。

A. 生活质量下降



B. 先下降再提高



C. 变化不大或稳中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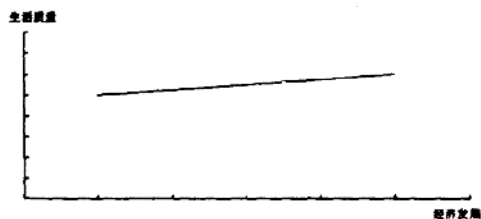


图 1-2-1 经济发展和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几种不同模式
(Hugo, 1991)

第二种学说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先下降再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现代化的关系是 U 形的,而不是线性的(图 1-2-1, B)。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 Palmore 和 Manton(1974)的观察,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老年人拥有的资源将相对减少,但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养老金计划等正开始使得这种早先的损失得到补偿。这一模型假定正式的机构支持系统正得到发展,逐步替代在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被削弱的非正式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支持系统。该模型表达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一种类型的高水平向另一种类型的高水平的转移,前者是以家庭支持为基础的,后者则基于以机构支持为支柱的支持系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当政府支持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补偿家庭支持的削减时,还存在着一个低生活质量的过渡期。某些作者指出,许多亚洲国家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处于 U 形曲线下落部分的不同点位上。

第三种学说认为生活质量变化不大或稳中有升(图 1-2-1, C),对老年人的家庭支持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而大幅度降低的观点提出异议。深入研究历史上和当今欧洲国家家庭内的代际关系和老年人生活质量,会发现某些作者夸大了家庭支持的降低,许多中等发展国家老人的这种传统支持就得到了维持(Evandrou 等, 1986; Hunt, 1978)。当然 老年人与儿孙同住的比例普遍地下降,但老年人本身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良发展,相反却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愿望。这是因为老年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自主和自由,只要他们的健康允许,他们经济状况的改善足以使他们自立门户(Wall, 1984; Michael 等, 1980)。再有,在许多中等发展国家,国家养老金和其他老年计划的发展,在工作时期能够积累可观数量的资产(尤其是住房)的老年人比例的提高,将使他们的平均生活质量得到提高(Hugo, 1986)。

上述几种模型似乎过于简化,但却反映了在发展和生活质量关系上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在

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的性质和速度方面的差异,因而不同的模型可适用于不同的亚洲国家。不过应注意到,尽管不同模型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上。令人感兴趣的是三种学说的共同点,即均强调老年人本身地位、支持系统的类型和总量改变以及不同类型支持系统间的互补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如果放弃对家庭支持下降程度的争议,伴随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人口的变迁、妇女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等等,在亚洲国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老年人仅仅依赖于家庭支持将是不够的。因而,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维持和提高,老年照顾必然涉及到家庭外的老年支持系统,包括国家、机构和社区等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新城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满意程度也就取决于他们所在社区的系统发展和有关安老服务政策。社区的系统发展计划和有关安老服务政策制定都需要得到科学指导,这就需要得到各方面的信息。198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大会就特别建议收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老年人的躯体、心理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信息,以便为将来的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要了解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需求。本书利用1995—1996年北京、上海、广州、苏州、香港五城市的家庭问卷调查资料,着重分析新城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健康功能状况、生活满意度及需求等。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制定新城区老年社区服务发展计划和有关安老服务政策,开展帮助新城区老年人“保持健康,独立生活,能在社会上积极发挥作用”的各种保健和社会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其具体目的为:(1)描述新城区老年人各方面的状况、分布及其在某些方面地区间的差异;(2)作出“社会诊断”,即寻找老年人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主要困难,揭示新城区高危老年人群;(3)探索影响老年人各方面状况的主要因素及其各方面状况间的相互关系;(4)提出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在中国,对此课题的研究目前刚刚起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

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郊社会经济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本研究涉及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许多理论需进一步充实,希望以此为新的起点,继续组织力量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第二章 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

长期以来人们把长寿作为人类的共同愿望,人类在提高寿命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中国内地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粗死亡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49年的20‰降至1953年的14‰、1964年11.5‰及1977年的6.9‰,此后便基本维持在6.5‰左右的水平;期望寿命也相应地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92年的69岁左右(中国卫生部,1989,1995)。香港的死亡率则下降得更早,在1956年粗死亡率就下降到7‰,到1964年进一步下降到5‰,至今都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期望寿命男性和女性分别从1961年的64岁和71岁增加到1991年的75岁和80岁。寿命的延长,存活率的增加,加之出生率的降低,必将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在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后,老年人口激增,比重提高,向科学家提出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老年人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虽然在个体水平上老年并不意味着衰老,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功能状况良好,但撇开对今后老年人的各种状况变化趋势的种种争论不谈,至少目前已有的证据表明,与年轻人相比较,老年人的患病率高且多种疾病并存,住院率高且住院时间长;与年龄有关的一些状况如听力、视力、咀嚼功能明显降低;认知功能的进行性衰退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精神忧郁则使部分老人遭受着痛苦;有些老人必须部分或全部依赖他人生活;同时老年人所得的社会支持却日益减少,诸如丧偶、子女离家、兄弟姐妹朋友死亡、退休后经济收入减少等。而且老年人的这些问题很少是孤立存在的,往往同时共存,涉及到躯体、心理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